

師大

台灣史

學報

No. 16-17

2024年2月29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一種難以釋懷的悲傷」書寫戰爭的暴力——  
法軍在福爾摩沙遠征（1884年-1885年）的  
記憶建構與寫作策略**

**鄧雅森 Arsène Donada-Vidal 著**

**黃瀨任 譯**

# 「一種難以釋懷的悲傷」書寫戰爭的暴力 ——法軍在福爾摩沙遠征（1884年-1885年）的 記憶建構與寫作策略\*

鄧雅森 Arsène Donada-Vidal\*\*

黃瀨任\*\*\* 譯

## 摘要

1884年8月至1885年7月，在費里(Ferry)政府的命令下，法軍封鎖臺灣。一年內，法軍佔領了北部的基隆和島嶼西部的澎湖群島，過程艱辛。這次遠征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所產生的結果。它被視為失敗且充斥許多暴力事件，也讓兩國間的暴行免於制裁。「遠東艦隊」(l'escadre d'Extrême-Orient) 這個特殊的軍隊編制下，有一群士兵在現場或事後記錄下他們的親身經歷。本文統整這些證詞，除了探討這些記錄的共同點與差異之外，亦說明在殖民背景下，集體記憶如何透過暴力的視角被建構。

關鍵字：清法戰爭、基隆、澎湖、證詞、集體記憶

\* 原文題名為 « "Une tristesse pénible dont l'esprit a peine à s'affranchir". Écrire la violence de la guerre : constructions mémorielles et stratégies d'écriture des soldats français pendant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1884 - 1885) »。預計刊載於 « La violence est ce qui ne parle pas » : les traces matérielles de la violence dans l'histoire, Travaux issus de la journée d'études des jeunes chercheurs ENC 2022, Cahier Jean-Mabillon, 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 法國國立文獻典章學院(法國國家案卷保管和古文書學院校, 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碩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1894 年年中，一本關鍵的清法戰爭著作問世——《法國遠征福爾摩沙，1884-1885》。<sup>1</sup> 該書被視為該次軍事行動的參考書。作者歐仁·嘉諾（Eugène Garnot）上尉嘗試對該次遠征做一個難度頗高的總論。該書受到許多稱讚，卻有篇過往一直被忽略的短文刊登在 1894 年 9 月 18 日的報紙《夏朗德記事》（*Les Tablettes des Deux-Charentes*）上。該文作者匿名，為保羅·第翁（Paul Thirion）上校所寫。他在文中指責嘉諾並沒有完整寫出 1884 年冬天至 1885 年所發生的暴力與恐怖。原因很簡單，因為嘉諾要直到 1885 年 1 月 26 日才抵達福爾摩沙。1894 年 11 月，記者採訪了退休的貝爾托－勒維蘭（Bertaux-Levillain）上校，他曾是軍隊的指揮官。貝爾托－勒維蘭認同第翁對嘉諾的批評，記者寫下：「他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他忽視了福爾摩沙遠征時可怕的情況。儘管其後軍營中的談話提供嘉諾當時戰爭的景況，但他的認知仍有所侷限。」<sup>2</sup>

歷史學家將戰爭的證詞作為史料，在方法論上的困難一直都值得討論。1929 年讓·諾頓·克魯（Jean Norton Cru）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證詞的討論不曾間斷。<sup>3</sup> 而在殖民背景下，這個難處也更加特殊。1884 年 8 月，正值法軍入侵北圻（Tonkin），當時法國與中國因為邊境緊張的局勢，雙方衝突達到頂點（清宣稱就歷史面而言，中國擁有對安南與北圻的宗主權）。對此，法國費里政府則出了主意：在短時間內佔領福爾摩沙。藉由佔領該島和島上的煤礦對中國施加壓力，以換取法國未來佔有中南半島較佳的條約談判條件，當時稱之為「擔保政策」（*politique des gages*）。六個月後，法國遠征軍陷於「福爾摩沙的泥沼」，他們佔領了基隆，卻被險惡的地形游擊戰搞得筋疲力盡。這批遭母國遺棄的部隊身心俱疲，發生許多極為暴力的行為與事件。

許多士兵認為有必要在現場或回國後，把他們所經歷的事情記下來。但是，作為證詞人和參與者，如何描述這段記憶？這些記憶缺乏了戰爭的正當性（先不論物資運輸，士兵被下令不抓俘虜，導致許多人被迅速處決。儘管每個案件根據情況而有所不同），是否因這次非正式的遠征而可能被視為是失敗的侵略？士兵們如何合理化他們的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敘述採用了什麼樣的寫作策略。這些敘述又如何與相同事件的其他敘述以及檔案抵觸？敘述，固然是一種建

<sup>1</sup> Eugè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Librairie Ch. Delagrave, 1894)

<sup>2</sup> Paul Thirion,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 souvenirs d'un soldat*, (Paris: Lavauzelle, 1898), p. 99.

<sup>3</sup> Jean Norton Cru, *Témoins : essai d'analyse et de critique des souvenirs de combattants édités en français de 1915 à 1928*, (Paris: Les Étoiles, 1929).

構。本文所提出的例子說明福爾摩沙遠征的自我書寫在宏觀上同質性極高，但是微觀來看，內容更顯複雜。本文嘗試勾勒出這些法軍描述的異同。

## 一、研究文本：整體的初步分析

研究文本有：17位作者的22篇敘述（詳見表一），部分敘述由同一個人所寫。14位作者為法國人，13位士兵和1位海洋測量工程師。接著，進一步區分作者在世時所出版對戰爭的敘述、作者過世後之出版，以及未出版的文本。18個法文文本中，作者在世時出版的有9件（6本回憶錄、2本科學著作、1封信），9件死後出版及未出版的文本（3本筆記及6封信）。除了以上18個文本外，還有3位他國作者的4篇敘述（1位英國商人、1位加拿大傳教士、1位是為清軍工作的美國人），該分類項目包括2本在作者在世時出版的自傳和2本日記。日記1本為作者在世時出版，另一本是死後出版。這些文本視角並非全面且均可受批評（尤其缺乏中文視角）。上述文本構成了法方不同證詞的代表，而3位他國作者不僅提供外部視角，還展示不同寫作策略所產生的鮮明對比。本文所研究的文本不算入早於1884年8月的著作。本文所討論的證詞敘述性質各不相同，有些聲稱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有些則呈現出更廣的作者群像；有些敘述的重點對象放在遠東艦隊，部分則集中討論北圻或福爾摩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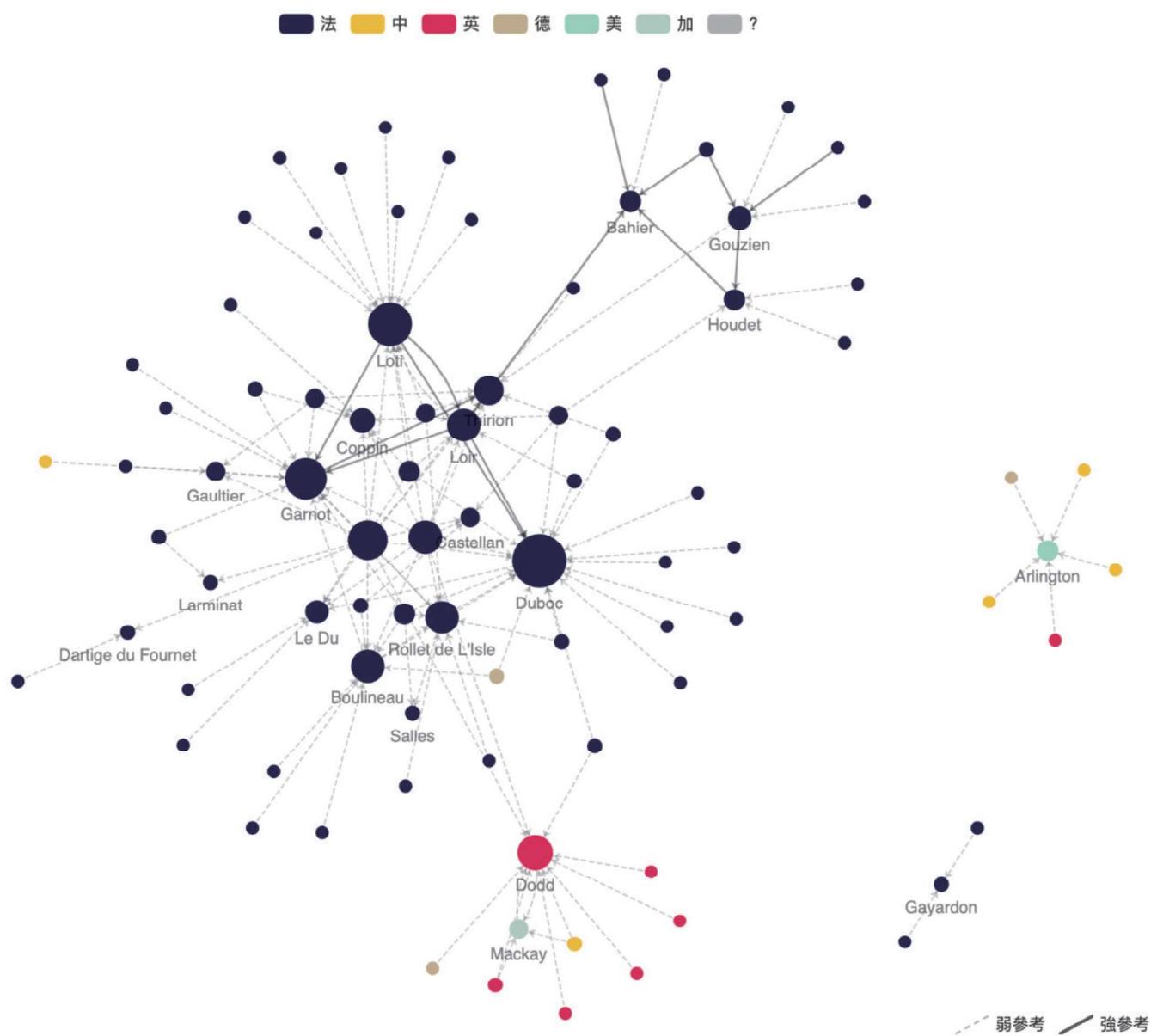
表一 本文研究之證詞文本

作者在世時出版
Anonyme [Jean Le Du], «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 in <i>La Terre illustrée : voyages, romans, aventures, curiosités, pêches, chasses</i> , vol. 1-26, Paris, 1890-1891.
Lewis Charles Arlington, <i>Through the dragon's eyes; fif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foreigner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i> , London, 1931.
Astius-Charles Castellan, <i>Histoire médicale d'une campagne sur la canonnière « la Vipère » en Annam, 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 thèse présentée à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i> , Lyon, 1888.
John Dodd, <i>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i> , Hongkong, 1888.
Émile Duboc, <i>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Courbet, Rivière (1882-1885)</i> , Paris, 1898.
Eugène Garnot, <i>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i> , Paris, 1894.
Paul Thirion, <i>L'expédition de Formose : souvenirs d'un soldat</i> , Paris, 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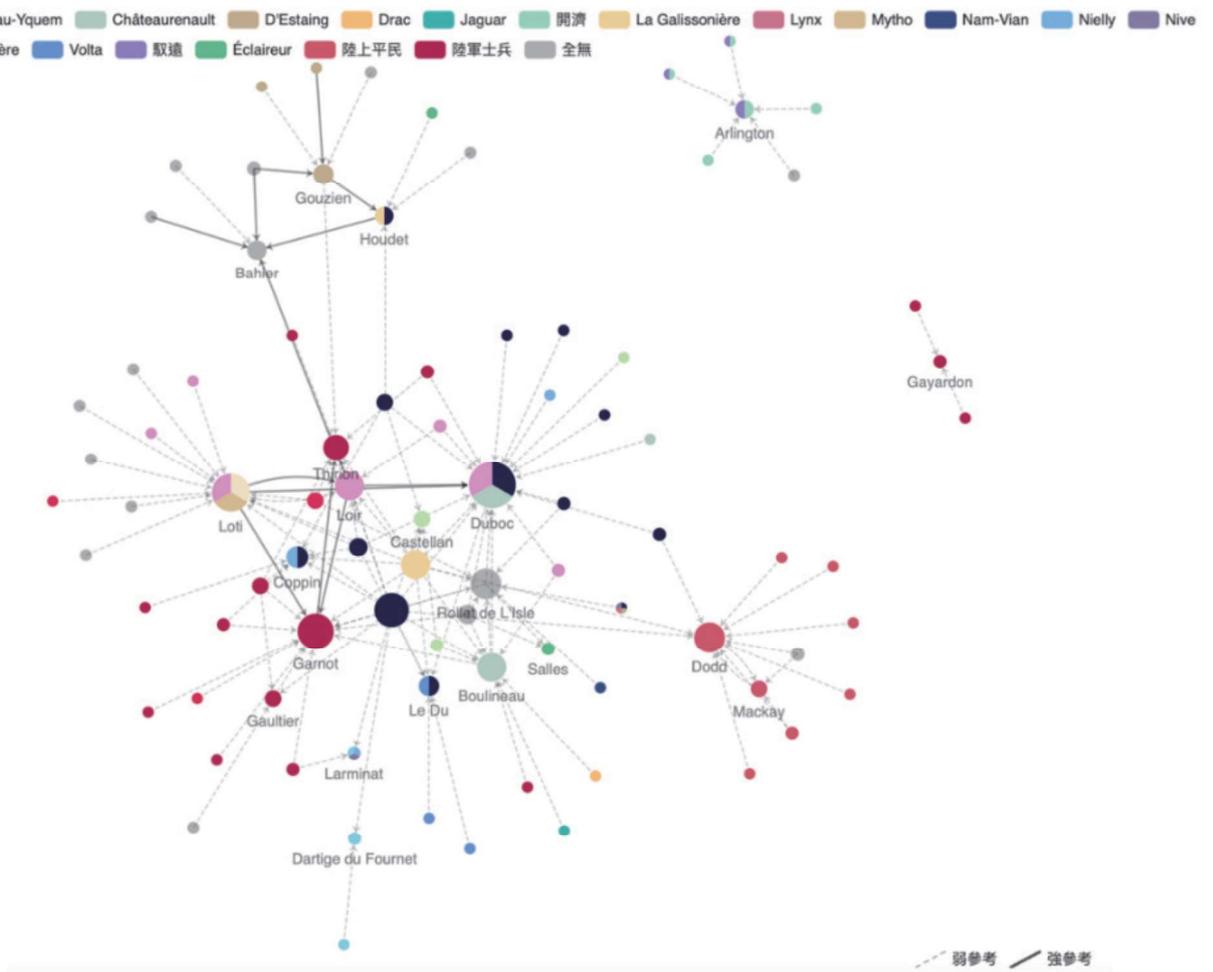
Maurice Loir, <i>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notes et souvenirs</i> , Paris, 1886.
Pierre Loti [signé Julien Viaud], « Sur la mort de l'amiral Courbet, écrit à bord de la <i>Triomphante</i> le vendredi 12 juin 1885 » in <i>Revue des Deux Mondes</i> , tome 70, 1885, p. 919-930.
George Leslie Mackay ; James Alexander Macdonald (ed.), <i>From far Formosa :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i> , Édimbourg, 1900.
Charles-Dominique-Maurice Rollet de L'Isle, <i>Au Tonkin et dans les mers de Chine : souvenirs et croquis (1883-1885)</i> , Paris, 1886.
André Salles, « A bord de l' <i>Eclaireur</i> , en escadre de l'Extrême-Orient », <i>Annuaire du Club Alpin Français</i> , Paris, 1885, p. 298-335.
未出版、死後出版
Thomas Boulineau, carnets « Journal du <i>Château-Renaud</i> » et « Correspondance du <i>Château-Renaud</i> »,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2 S 14-15 ; 22-23.
Fonds René Coppin, correspondance et <i>Souvenirs et impressions de ma campagne dans les mers de Chine à bord du « Nielly »</i> , Musée national d'histoire de Taïwan.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手稿一批〉(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檔案號：2011.012.0193
Louis Dartige du Fournet, lettres à ses parents,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5 Mi 109 (1).
Gayardon de Fenoyl (Comte de), <i>A la mémoire de mon cher fils Charles de Gayardon, Cte de Fenoyl, adjudant d'infanterie de marine, tué à l'ennemi à Kélung (île Formose, Chine), le 5 mars 1885</i> , Trévoux, 1885.
Joseph Le Genissel, <i>Joseph de Larminat, lieutenant de vaisseau, mort à Kelung (Formose), le 19 février 1885</i> , Paris, 1888.
Pierre Loti, <i>Journal, Volume II : 1879-1886</i> , (éd. Alain Quella-Villéger et Bruno Vercier), Paris, 2008.
Pierre Loti, <i>Lettres de Pierre Loti à Mme Juliette Adam (1880-1922)</i> , Paris, 1924.
George L. Mackay, 馬偕日記 [Ma xie riji], <i>The diary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i> ,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文化中心；新北市：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 (Taipei :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Digital Culture Center) [En ligne], 2015.

以下四張網絡分析圖呈現出文本視覺化的成果，圖中呈現戰爭證詞敘述傳遞網絡（圖 1、2、3、4），可於線上瀏覽。<sup>4</sup> 每位作者代表一個標有姓名的節點，線則表示該作者聲稱從明確的他者所接收到口頭或書面的消息，其中大多數是口頭傳遞。線連接了消息方與作者方。因此，圖並不能代表在戰爭期間消息實際傳遞的情況（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誰向誰提供了什麼消息」），而是代表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提到接收到的消息來源。筆者將該引用及點出消息提供者的傾向，稱之為作者書寫的害羞程度（*le degré de timidité d'écriture de l'aute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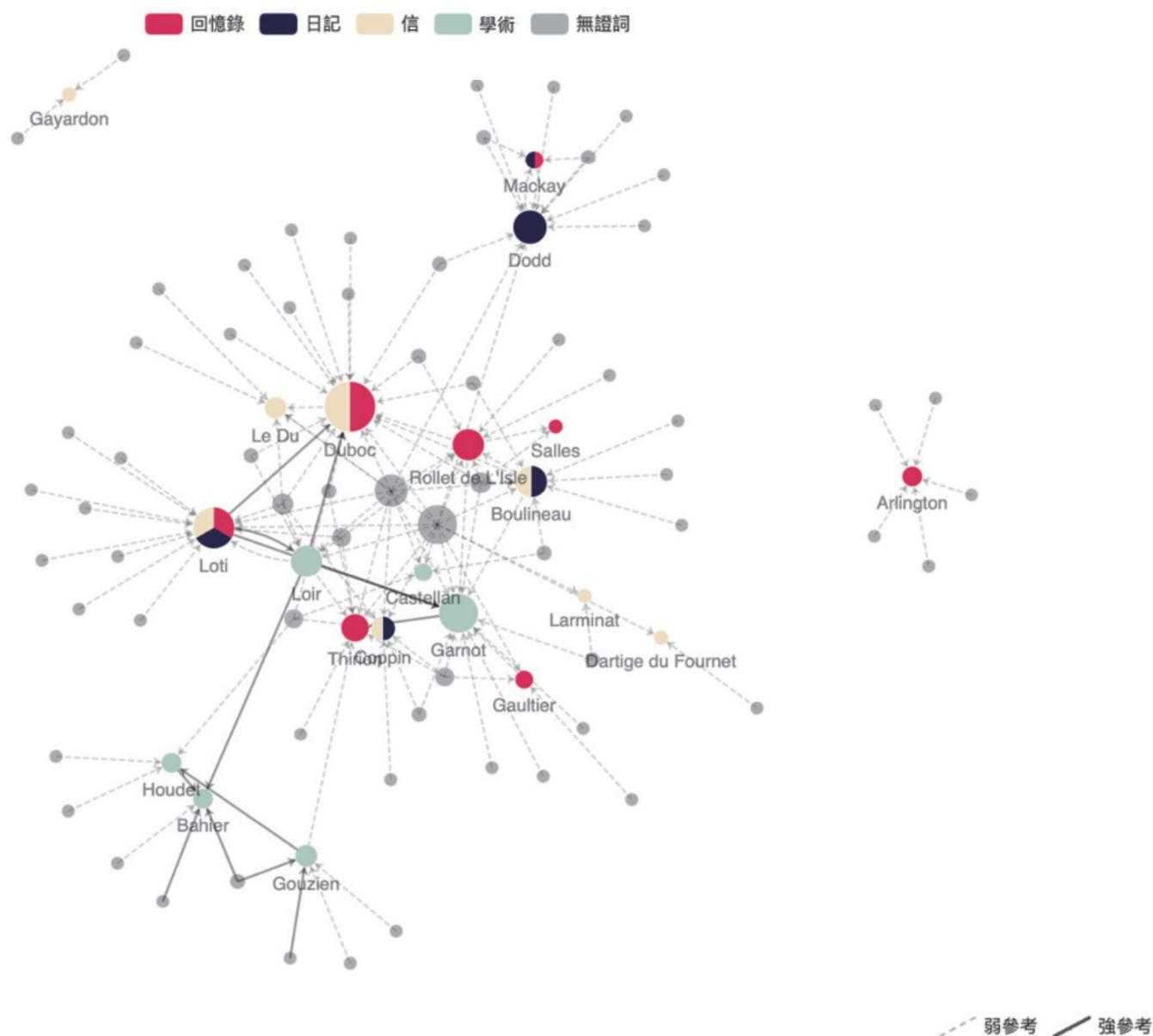
<sup>4</sup> Arsène Donada--Vidal, Gaspard Donada--Vidal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1884-1885", 2023. 中文版可見：<https://g-dv.gitlab.io/formosa/zh>。線上圖表另有補充本文未提及之證詞，如遠征軍隊醫生著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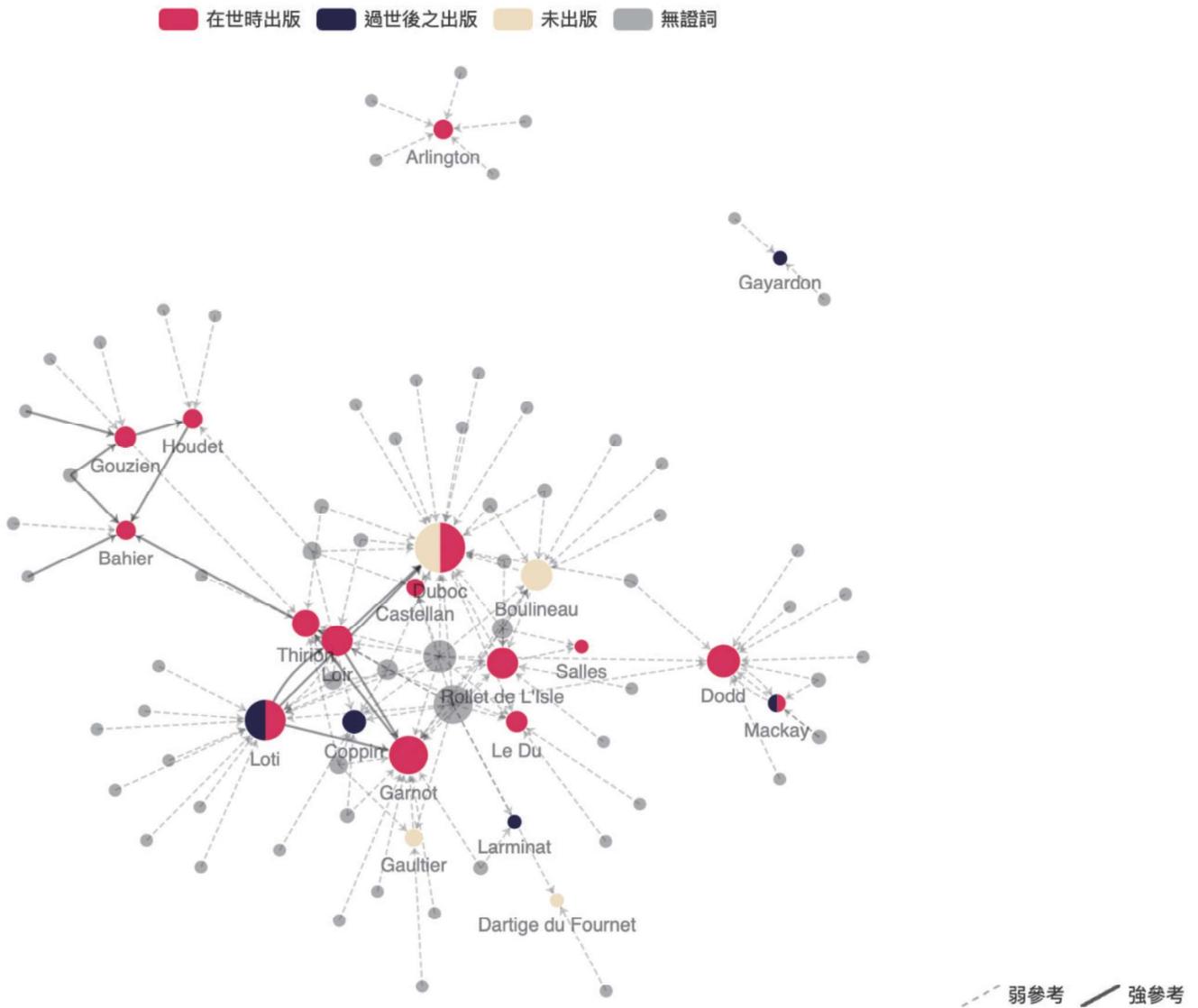
圖一 以國籍分類之作者（標示姓名）與其消息來源（未命名的節點）  
網絡圖



圖二 同圖一，以據點（船隻）分類



圖三 同圖一，以證詞種類分類



圖四 同圖一，以出版情況分類

綜觀以上，可以得到初步的分析結果。

首先，法國人不太願意提及他國人所提供的消息來源，儘管這些消息佔了多數，例如：來自中國翻譯、英國的領航員和領事、間諜等。第二，作者之間有「內婚現象」，他們會從與自己日常生活相關的人中獲得消息，例如：同船的人、在同一部隊工作的人。第三，一些在戰爭結束後撰寫的敘述，也不諱言自己是參考其他參與遠征軍的資料，也有引述其他已經出版著作的情形。例如：嘉諾多次引用

了羅瓦爾的回憶錄，而羅瓦爾則引用了許多戰爭期間與戰後發表的報告；杜博克（Émile Duboc）則引用了羅第（Pierre Loti）的文章。<sup>5</sup> 這些情形都在圖表中以實線表示。

引用的情況也因文本性質有所不同，例如：私人信件中通常不太會引用其他人的說法，而日記或出版品則較常引用。

圖表分析還顯示了作者在書寫上的「害羞程度」。例如，以色爾（Rollet de l'Isle）因具有科學家的特殊身份，他幾乎在所有艦隊的船上都住過，除了有豐富的人脈關係，也過著豐富的社交生活。不過，他詳細的回憶錄中也就因此相對地較少引用其他人作為消息來源。

## 二、證詞的真實性問題：以《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

歷史證詞的研究顯示了見證的真實性，並非取決於描述與真實的差距程度多寡。相反地，謊言、操作、遺漏和主觀偏見在自我書寫中則佔了一定比例。因此，理解作者為什麼，以及如何決定省略某些資訊，可能比討論一個完全與事實相符的證詞更有意義。只有當文件偽造的時候，證詞的真實性才會受到質疑。本研究的文本資料中可能沒有造假的案例，但是有一個特殊的例子值得討論。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是一部號稱在清法戰爭期間一名年輕水手寄給母親的信件抄本，在1890至1891年間刊行在第1至26期的《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1895年編纂後出版。<sup>6</sup> 該文本2000年代被研究者發現，也被翻譯成中文重新出版。<sup>7</sup> 《地球畫報》沒有提供這名年齡不超過17歲的年輕水手的姓，僅有名字Jean。小水手在信中展現了一個年輕士兵首次經歷暴力的證詞。這位水手天真的寫作風格，毫不遮掩地描繪出極為暴力的事件，為此感到衝擊。這些信件有助於彌補與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證詞文本所存有的差異。一直以來流傳下來，或出版的文本大多數來自高階軍官、海軍、學者以及法語使用者的著作。<sup>8</sup> 小水手在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寫道：

<sup>5</sup> Émile Duboc,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Courbet, Rivière (1882-1885)*, (Paris: Charavay, 1898), p. 311.

<sup>6</sup> Jean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L. Boulanger, 1895).

<sup>7</sup> L., Jean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

<sup>8</sup> 被派遣福爾摩沙的軍隊主要由法國的非洲部隊、從北圻調派的部隊組成。法國外籍兵團的成員不僅佔了其中的一半，且其主要溝通語言為德語。

當我們看到中國人時，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打他們；我可以告訴你，我這麼做了。[……]多麼奇怪的一件事！……當刺穿肉體，會發出撲的一聲！然後，一陣撕裂聲……[……]倒下意味著死亡……因為這些土匪既愚蠢又兇殘，他們會停下來割下那些已經倒地的人的頭……一下子就結束……但仍可以拖延他們的速度……我曾經這樣打一個在對我同伴下手的人……我們得靠這種愚蠢的暴行才能活下來……[……]最可怕的是，那些留在我們身後的血泊...這看起來並不像一場勝利...我們什麼也沒說，但我們卻都這樣想……你知道的，有些時候，保持沈默是最好的選擇……<sup>9</sup>

因為畫報沒有提供消息的實際來源，使得人們對該文本的真實性有所懷疑。儘管如此，因為文中所提供的資訊鉅細彌遺，以至於不可能認定作者沒有去過福爾摩沙。透過比對檔案和其他文本的分析，可以知道作者確實存在：Jean Le Du。<sup>10</sup> 他的信也是真實存在。然而，他的證詞可能被畫報的記者瓦德（Charles-Lucien Huard）修改過。<sup>11</sup> 除了明顯的拼字更正外，某些段落可以肯定有被擴寫（藉由當時其他已經出版的作品）或刪減。只是因為原始的信件已不可尋，所以很難知道內容重新編輯的程度。總之，《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的資料來源並不完整與真實；而該書在許多研究中被引用，大致上也都忽略了這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

### 三、一個事件、不同作者、各種說法：以佔領馬公為例

1885 年 3 月 25 日，法國海軍不滿被困於基隆，佔領了澎湖群島。主要城市馬公遭到疲憊、因被指責停滯不前感到沮喪的軍隊摧毀與洗劫。然而，這次的佔領在法文著作中從未被譴責（除了羅第（Pierre Loti）的特殊情況）。佔有澎湖群島作為法國殖民地的想法，基本上是所有書寫者共享的；在這方面，大家的看法一致。然而，他們描述在馬公所發生暴力事件，方法上卻有明顯差異。以下提出 5 位代表不同觀點的作者，他們都提到了 1885 年 5 月所發生的事。

第一種情況是完全遺漏。杜博克（Émile Duboc）在他的回憶錄中只提到馬公被摧毀，最多只提到 1885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的戰役。

<sup>9</sup> J. L.,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p. 68-70.

<sup>10</sup> 他的兒子也做了許多事情讓父親的故事變得更加有名的事蹟，例如：參加紀念活動、將檔案捐給相關機構等。

<sup>11</sup> 這位編輯曾報導有關北圻問題的新聞，尤其為《地球畫報》工作。該出版社於 1886 年出版一本有關殖民爭戰的綜合性書籍，而《孤拔元帥的小水手》也引用了該書的插圖。

第二種情況是部分遺漏，由薩勒（André Salles）的描寫。<sup>12</sup> 他寫道：

這裡的居民對我們沒有任何敵意。除了馬公之外，沒有其他村莊被毀或被搶。居民很快就放下戒心，自薦擔任苦力，或來賣魚、賣菜、賣牛肉。<sup>13</sup>

羅瓦爾（Maurice Loir）在忽略掠奪行為的同時，也描述了馬公的特殊情形。在他的筆下，一切行動變成了一種衛生整治：

到了四月底，必要的工作全部結束，指揮官開始觀察村莊的衛生狀況。如果不處理的話，這座城市的骯髒滋生出不明的霍亂與傷寒。我們填了兩三條骯髒的小溪流、拆除周圍不整潔的房屋、清理廢墟，並開闢寬廣的街道。<sup>14</sup> 大量使用硫酸鐵和苯酚後，衛生狀況逐漸得到改善。

助理醫生科邦（René Coppin）則在 1885 年 6 月 5 日寫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

現在大約有一萬居民的馬公只剩下一片廢墟與火海。加上其他村莊都被洗劫一空。砲臺一片混亂；所有的砲口被炸了[……]而中國人留下了 600 具屍體[……]田裡有埋著中國人屍體的坑，每走一步就碰上砲彈碎片。<sup>15</sup>

羅第（Pierre Loti）毫不保留地在日記中記下 1885 年 5 月 31 日的掠奪事件，進一步描繪：

這座被艦隊毀掉的城市馬公。所有的房子都被破壞、燒毀；處處廢墟。我們走在瓷花瓶碎片、遮陽傘、絲綢布的碎片上，儘管已清理過屍體，還是有一股惡臭。中國的俘虜，也就是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工作[……]令人驚豔的雕塑、鍍金的木雕被堆在地上，準備被燒掉……[……]恐怖的景象、死亡的氣息[……]整個下午我也參與了這場毀滅行動，像是拆下樣子奇妙的門、拔掉鍍金的木雕與神獸像，我為自己太晚到感到遺憾……[……]在馬公的廢墟中，沒什麼可以帶走的了；都被搜刮、清理，已空無一物。晚

<sup>12</sup> 薩勒為法軍遠征的三位攝影師之一。

<sup>13</sup> A. Salles, "A Bord De « L'Éclairer » En Escadre De L'Extrême-Orient (Novembre 1884 — Octobre 1885) ", *Annuaire du club alpin français* 12 (1885), p. 325.

<sup>14</sup>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Berger-Levrault, 1894), p.275

<sup>15</sup>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19〉(1885 年 6 月 5 日)(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檔案號：2011.012.0193.0019。

上熊熊大火燃起，散發出中國與麝香味，直到燃燒殆盡。甲板上大家的腳上都穿著他們得來的中國戰利品；[……]馬公，永遠的墳墓。<sup>16</sup>

1885 年 5 月 5 日一頁上，羅第寫下：「我們佔領了這座城市……」但是，之後的一頁消失了，事後被撕掉了。為什麼他們在敘述自己的記憶時，會出現這樣的遺漏，甚至是操作呢？筆者認為，羅瓦爾（Loir）的記錄十分真誠，也沒有和其他描述矛盾。藉由省略掠奪行動而專注城市整治，羅瓦爾也試圖將被唾棄的「費里—北圻」政府放棄澎湖群島的行動，描繪成一個不可忽略的地緣政治之失敗，這種錯誤不應在殖民記憶中被遺忘。隱瞞這種特定的暴力行為，意味著參與建構把殖民遠征神話化的記憶。這種記憶停滯於法國本土，一個陷於機會主義的共和國更迭中。<sup>17</sup> 引人關注的還有，有別於在出版的著作中被美化、帶有殖民使命感色彩的敘述，私人信件和日記可能呈現不同的內容。有別於將之對比為偏向「現實主義」的作者和偏向「理想主義」的作者，可以說：所有作者基本上都共享一個觀點（其中有些人是朋友），並且他們會根據文本授予的對象，選擇不同的寫作策略。作者知道他們對於詮釋國家的記憶有權力。這些出版品，甚至一些是暢銷書，塑造出了一種殖民遠征的集體想像。然而，就算這些著作塑造出了神話般的集體記憶，大眾輿論還是把這次遠征當成是更偉大的、更重要的中南半島征服戰中發生的軼事而已。

---

<sup>16</sup> Pierre Loti, *Journal, Volume II : 1879-1886*, (éd. Alain Quella-Villéger et Bruno Vercier),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8), p. 600.

<sup>17</sup> 機會主義共和派（*République opportuniste*）是用來形容 1870 年至 1900 年代法國政治情況。因為當時政府（如：費里等）在面對競爭激烈的局勢下，企圖討好群眾以爭取支持，選擇偏向投機主義。又被稱為「中間派」或「溫和派」（*républicains modérés*）。



圖五 薩勒拍攝基隆的城市與港灣

資料來源：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43.

#### 四、一個事件、相同作者、不同說法：以福爾摩沙南部海上攻擊 為例

不同作者對同件事情的敘述存在差距，這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同一個作者的論述中。這一點尤其引人注目，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那些理想化暴力的法軍，親身經歷過後，也會感到懊悔和失望。例如，柯邦（René Coppin）與同船夥伴超過 76 天只能靠著培根、罐裝豆子為生，他在 1885 年 3 月 23 日寫信給他的母親：

但是，當我們轟炸了這些「天朝之子」後就會上岸，我們會掠奪他們；我們要吃光他們的食物。你看，我們目前的野心並不大，我們只夢想著白菜和胡蘿蔔。但是，我們必須接受當前的處境，耐心等待時機成熟，擊倒他們並讓他們求饒。<sup>18</sup>

這類好戰的修辭與兩個月後（1885 年 6 月 8 日）在馬公廢墟中寫給他母親的信，形成強烈對比：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行刑，但我真心希望這也是最後一次。我沒有選擇，因為我是被命令的。隔天晚上我無法入睡，做了一個可怕的惡夢，回想起那兩個被綁在柱子上的中國人；他們非常勇敢，沒有絲毫軟弱。<sup>19</sup>

針對細部描述的檢視比冷冰冰的整體性分析來得立體許多。雖然找出普遍的趨勢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個人的經歷多樣且複雜，而每個人的旅程中都發生了著根本性的變化。這本身就是一種常態。

法軍宣布完全封鎖臺灣，法軍追捕、檢查並摧毀所有試圖運送武器或彈藥到島上的船隻。如果船上攜帶武器或彈藥，船員會立即被槍決，船舶則被擊沉。1885 年 1 月 21 日，尼利號（Nielly）執行了一次封鎖任務，科邦（Coppin）也在船上。但是情況發生了變化。該艘漁船沒有回應法軍船艦的要求，漁船靜止不動卻也沒有企圖逃跑，但是中國船員並沒有現身甲板。尼利號向漁船開砲。柯邦在 1885 年 1 月 23 日至 30 日期間寫信給他的母親：

我差點忘了要告訴你航行期間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很重要，因為我一生都不會忘記。[……]那時，我們看到有 10 或 15 個可憐的人在沉船碎片中努力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東西，他們顯然是因為恐懼而一直躲到最後一刻。現在他們努力保命，其中有一隻羊在掙扎，一隻貓緊抓著一塊木頭。我們試圖將這些大多數的人救上小艇；成功救了 11 人；至於其他人，只見他們消失在浪潮中；還有一些人已經半死不活，因為他們被在船上爆炸的砲彈炸傷。這一幕令人恐懼又可怕，我看到一個中國人抱著一個小男孩，浮一

---

<sup>18</sup>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16〉(1885 年 4 月 14 日)(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檔案號：2011.012.0193.0016。

<sup>19</sup>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20〉(1885 年 6 月 8 日)(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檔案號：2011.012.0193.0020。

塊木頭上。目睹這一幕的水手們發出了歡呼聲，也許他們是對的，因為他們說了一句非常正確的話：如果換作是清軍，他們可能也不會幫助我們，而是想辦法讓我們更快沉下去，或把我們救上來繼續折磨。我會永遠記得這一幕，我們成功救了那隻羊，但這隻可憐的羊一條腿卻被砲彈炸碎了。這 11 個中國人還在船艦上，他們還有同伴，因為晚上我們又攔截了一艘上面有 23 人的漁船。<sup>20</sup>

同一星期的 1 月 21 日至 23 日期間，他在日記中描述了相同的場景：

那時，我們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中國人被殺或負傷都漂在海面上，其他活著的人發出恐怖的尖叫聲，抓住漁船的殘骸，一隻腿斷了的山羊在水面上掙扎，一隻漂亮的貓留在一個還算寬的木板上發出害怕的叫聲。兩艘小艇救出了 7 個人，其中 2 人可能因為木頭或砲彈的碎片受到輕微擦傷。我們把他們囚禁在船上，也救出了那隻可憐的山羊，用來餵他們。他們讓我們知道其中有 7 人被砲彈擊斃或淹死。然後，我們繼續前進，到達臺灣府（Tai-wan-fu）。在那我們見到最近擊沈 33 艘漁船的德斯丹號（d'Estaing）。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真正的屠殺。現在所有人都收藏豐富，有鼓、鑼和其他在船沉前從上面找到的樂器。<sup>21</sup>

比起日記所述，科邦對母親更顯感性。他在戰爭結束後仍很常閱讀日記（也許他曾考慮出版），卻在信件中省略了戰友在這暴力景象前正當化了的娛樂行為。一個月後，在面對同樣的砲擊時，柯邦已不再受影響。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倖存的中國人數從 11 人減少到 7 人。這只是遺漏嗎？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兩個敘述都是在同一週寫的，而且作者似乎在日記一開始寫「onze」（法文數字 11）開頭的一字，然後將其更正為「sept」（法文數字 7）。針對科邦敘述的研究，提醒了我們其他以不同形式書寫暴力的作者，如：杜博克（Émile Duboc）、羅第（Pierre Loti）、馬偕（George Mackay）和布里諾（Thomas Boulineau）。

<sup>20</sup>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8〉（1885 年 1 月 23 日）（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檔案號：2011.012.0193.0008。

<sup>21</sup> 〈清法戰爭期間 Rene Coppin 書信 23〉（1885 年 8 月 13 日）（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檔案號：2011.012.0193.0023。



圖六 薩勒拍攝被抓的中國漁民

資料來源：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SG XXCA-3.

## 五、暴力作為集體記憶的框架

克里克（Corinne Krouck）在她對 1870 年普法戰爭軍人證詞的研究中，將戰爭記憶分析為「出色的從眾」（*remarquable conformisme*）。<sup>22</sup> 她說道：「重述自己的戰爭回憶，可能更多是為了凸顯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立足點，而不是為了顯示自己與眾不同。」<sup>23</sup> 她的分析適用於討論有關福爾摩沙遠征回憶文本。這些法軍書寫者不是為了尋求特殊性，他們欣然地提及他們忠於遵守命令，甚至在使用暴力方面也是如此。很少有作者將他們的暴力行為歸因於對他者的仇恨。相反地，他們將之視為嚴格遵守命令和「迫切需要」的結果。<sup>24</sup> 本研究認為，戰爭回憶錄作為個人自我書寫的頂點，不是個人的作品，而是集體的。回憶是共享的，以不

<sup>22</sup> Corinne Krouck, “Stratégies d’écriture et représentations de la guerre, L’exemple des combattants de 1870,” *Sociétés & Représentations* (Paris) 13 (April, 2002), p. 177.

<sup>23</sup> *Ibid.* p.177.

<sup>24</sup> Paul Thirion,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e marine*, (Paris: H. Charles-Lavauzelle, 1899), p. 120.

同的形式共享。該群體建立於根深蒂固與持續被維持的神話之上，內容包含對孤拔上將的崇拜與神化、對費里政府的憎恨、對於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戰的確信與堅定意志，以及對澎湖群島的殖民等等。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們可以在所有的作品中找到相同的、非常具體的暴力場景（儘管在戰爭中這樣的場景很常見）。例如：士兵克萊蒙讓·朱勞（Clément-Jean Julaude）於1884年8月5日至6日晚上，成功地從中國軍隊剛剛佔領的營地，奪回一面法國國旗的英勇事蹟；福州戰役後，浮在水面上的中國人的屍體（「一種令人難以釋懷的悲傷」<sup>25</sup>）；「紅衣小姐」引誘兩名法國士兵落入埋伏、被斬首；當地人洗劫法國墓地，以獲取人頭獎金等等。以上具體的軼事就算幾乎沒有任何一位作者親身參與，幾乎在所有的文本中都能看到。可以說，法軍所遭受到的暴力亦是共享的。

這些有著重要意義的暴力軼事即構成了阿博瓦胥（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的「參照點」（*points de repères*）或「化石化的椎骨」（*vertèbres fossilisées*），<sup>26</sup> 建構了個人「借來的記憶」的一部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法文敘述的文本有如一個巨大的、互相呼應並連接的「超作品」（*méta-oeuvre*）。在當中，我們可以找到被訴說、重複訴說、被寫和重新書寫的故事。這些故事以一種片面的方式，透過被不斷描繪，以吉拉德（Girardet）的話來說，進而神話化了。<sup>27</sup> 如果對於記憶的描寫是一種建構，<sup>28</sup> 那麼，基於這種記憶的記憶固然也是一種建構。正如阿博瓦胥在他關於集體記憶的兩本開創性的著作中所述。<sup>29</sup> 「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回音[……]所以，這些回憶是屬於『大家』的。」<sup>30</sup> 儘管針對某些事情有不同的觀點，但這些有關清法戰爭的文本都是由具有相同觀念的作者所寫（如：馬公一例），而絕大多數對於暴力的敘述都是高度一致的。

---

<sup>25</sup> Maurice Loir,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 124.

<sup>26</sup>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1925],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p. 89.

<sup>27</sup> 相關論述可見其1986年出版的《神話與政治神話學》（*Mythes et mythologies politiques*）與1972年的《法國的殖民主義思想》（*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sup>28</sup> 克里克（Corinne Krouck）的研究已證明該點。

<sup>29</sup> 兩本著作為《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與《集體記憶（遺作）》（*La Mémoire collective (posthume)*）。

<sup>30</sup>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 90.

## 引用書目

L., Jean 著、鄭順德譯

2004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Cru, Jean Norton

1929 *Témoins : essai d'analyse et de critique des souvenirs de combattants édités en français de 1915 à 1928*. Paris: Les Étincelles.

Duboc, Émile

1898 *35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Courbet, Rivière (1882-1885)*. Paris : Charavay.

Garnot, Eugène

1894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 Librairie Ch. Delagrave.

Halbwachs, Maurice

1994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1925]. Paris : Albin Michel.

1997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 Albin Michel.

Krouck, Corinne

2002 “Stratégies d'écriture et représentations de la guerre, L'exemple des combattants de 1870”. *Sociétés & Représentations* :13(1) : 165-178.

L. Jean

1895 *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 L. Boulanger.

Loir, Maurice

1894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 Berger-Levrault.

Loti, Pierre

2008 *Journal, Volume II : 1879-1886*. éd. Alain Quella-Villéger et Bruno Vercier. Paris : Les Indes Savantes.

Salles, André

1885 “ A Bord De « L'Éclaireur » En Escadre De L'Extrême-Orient (Novembre 1884 — Octobre 1885) ”, *Annuaire du club alpin français* 12, 298-335.

Thirion, Paul

1898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 souvenirs d'un soldat*. Paris : Lavauzelle.

1898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e marine*. Paris : H. Charles-Lavauzell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www.bnf.fr/fr>

L'expédition de Formose 1884-1885, <https://g-dv.gitlab.io/formosa/>

“A painful sadness from which the mind barely frees itself”.

Writing the violence of war: memory constructions and writing  
strategies of French soldiers during the expedition in Formosa  
(1884 - 1885)

Arsene Donada-Vidal

### Abstract

Between August 1884 and July 1885, the French army,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Ferry government, blockaded Taiwan. In one year, with difficulty, it occupied Keelung in the north and the Pescadores Islands in the west. This distant expedition, the result of an undeclared war, was experienced as a failure and was marked by events of great violence together with the impunity of the exactions committed under both flags. In this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the Far East squadron), some soldiers wrote, on the spot or afterwards, the account of what they experienced. The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se testimonies shows, beyo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points, how a collective memory is through the prism of violence constructed in a colonial context.

**Keywords:** Sino-French War, Keelung, Penghu, testimony, collective memory

